

《漢語詞義學》序

申小龍

復旦大學中文系

兩年前，當蘇新春先生把他的《漢語詞義學》初稿送給我的時候，我就深受鼓舞。不僅因為這部著作科學地總結了當代漢語詞義研究的豐碩成果，也不僅因為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對漢語詞義理論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而是由於這部專著的出現顯示着我國語言學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語義的時代。

縱觀中國語言學兩千多年的變遷，我們可以發現一條很有意思的曲綫，即傳統小學以語義的訓釋、析解為中心；而本世紀初開始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則以語形的分析為科研最高追求；進入八十年代以後，漢語的語形分析危機四伏，無論是句法分析還是詞法分析，都開始引入語義知識，人們終於開始認識到語言在本質上是一種人文現象，是一個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脫離了語義則無所謂語形。就在這時候，語義的迅速蘇醒有了擺脫語形，建立獨立的漢語詞匯學、詞義學的「自我」意識，一批中青年學者開始同時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切入語義的獨立研究。這股思潮和語法研究中的語義取向形成一股合力，朝中國文化語言學的方向迅速發展起來。我們可以說，中國語言學正在進入「語義的時代」。

中國現代語言學中不大重視詞匯語義的研究，這是一種十分深刻的文化錯位現象。不要說八十年代之前缺乏系統的漢語詞匯語義理論，就是具體的研究也是寥若星辰。據統計，1900年至1949年古漢語語法的論文共發表了47篇，1950年至1984年猛增到284篇，增長率是504%。同期古文字的論文則由271篇上升到521篇，增長率是92%。而古漢語詞匯的論文則由前50年的848篇下降到後30年的472篇，下降了44%。在專著方面，後30年古漢語詞匯的著作也只有2部，遠遜於文字（42部）和音韻（8部）。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就在於中國語言學在轉化的過程中，片面將形式化這一歐洲近代科學的理想作為漢語分析的宗旨，始終未能形成漢語語義的系統研究的氣候，因而語義研究長期萎縮在訓詁學、文字學這些古老的學科內。

隨着當代人類科學的進步，文化語言研究中對人文因素的重新發現與肯定，漢語的語義研究也迅速發展起來。它首先表現為漢語詞匯學的繁榮，諸如詞匯學與訓詁學劃界之爭，單音詞與複音詞研究，同義詞研究，同源詞研究等都先後形成了熱點。進入八十年代之後，漢語語義研究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這就是詞義研究的異軍

突起。據1980年起國內發表的900篇古漢語詞匯研究論文的統計，儘管大部分仍是詮釋具體字詞的文章，但探討古漢語詞義理論的論文已有近200篇之多。「詞義熱」的興起顯示出漢語語義的研究日趨成熟。它表明當代漢語學者在使語義研究傳統現代化的努力中找到了突破口。詞義研究一開始雖然是純語言學的研究，但是由於語義亦可作為文化闡釋的基本依據，詞義研究與文化研究迅速產生互動的效應，形成良好健全的學術生態環境，這正是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語言學者夢寐以求的境界。

在蘇新春這部著作中，我們對當代漢語詞義理論的各個層面獲得了系統而深入的了解。從本體論來說，在詞義的基本屬性方面，作者討論了漢語詞義的社會性、歷史性、民族性、概括性、具體性、靜止性、運動性、系統性等；在詞義成分方面，作者討論了漢語詞義的深層義、表層義；在詞義系統方面，作者討論了漢語詞義的微觀結構、中觀結構、宏觀結構。從方法論來說，作者身為一位多年從事詞義研究的專家，對漢語詞義研究的各種方法及其沿革作了詳瞻而又深刻的闡述。在具體的論述中，作者對漢語詞義的運動規律作了相當細緻的刻畫，例如有義位義之間的詞義運動，義位義向詞位義的運動，詞位義之間的運動等。尤其可貴的是，作者對漢語詞義理論的探討充分汲取了傳統訓詁學的營養。例如在探討詞義的概括性和具體性時，作者認為：了解了詞義的概括性和具體性，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認識「小學之訓詁貴圓，經學之訓詁貴專」，辭書釋義較泛，注釋文釋義較窄的特點，並進而認識詞義分化派生的內在制約因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傳統訓詁學對古籍的整理和文義的疏通為古漢語詞義的研究廓清理解障礙。傳統訓詁學對古漢語詞義的認識成果和處理方法，顯示出傳統詞義理論的相當高度，將成為漢語詞義學的有機理論成分。漢語詞義學的研究往往以訓詁學提出的詞義問題為突破口，以容納了豐富詞義現象的訓詁典籍為重要參考材料，以挖掘整理重要訓詁學家的詞義見解為綫索。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提出的漢語詞義學可以視為傳統訓詁學語義理論的一種現代條理和創造性轉化。這就使作者自始至終運用着一種具有深廣的文化內涵和明晰的思維軌迹的語言。這種語言體現着我國新一代語言學工作者的「世界觀」，也預示着我國語言學走向新世紀的新的學術範型。

從本質上說，詞義的研究是一種文化的研究。它研究的是規定一種文化的精神狀態乃至生存狀態的意義系統。蘇新春在他的詞義研究中正貫注着這種可貴的文化意識。在本書中他於「結構篇」之後專列「人文篇」，對漢語詞匯的文化內涵作了多方位的考究，從文化因素的消長進退看詞語的產生和消失，從文化心理、習俗看詞的命名和詞義的演變，從文化的觀念體系看詞匯的系統，尤其對漢語詞匯結構的具象性和辯證性作了深入的、富有創見的闡發。在本書的「史論篇」中，他首次提出了古漢語詞匯研究的人文價值、現代詞義研究的人文主義學派問題，並對當代漢語詞義的人文研究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展望，在漢語詞匯、詞義學史的研究上獨具慧眼，開風氣之先。漢語研究中的人文主義思潮始於本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國句型文化》、《漢語人文

精神論》、《中國語言的結構與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還是科學主義？》、《中國文化語言學》等一系列著作中對漢語的人文性和與之相適應的漢語研究的人文主義方法作了闡述，但這些闡述主要集中在語法方面。蘇新春這部著作從詞匯、詞義的方面又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漢語人文研究的新天地，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期待着有更多的學者在各種不同的領域從事這種文化語言學範式的工作。最近我先後應日本中國語學會、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關西大學、東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的邀請講學，日本漢語學界對中國當代語言研究中的人文主義新範式表示了濃厚的興趣。他們希望漢語研究能走出一條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語文傳統特色的現代化的新路來。在這一方面中國年輕的語言學工作者責無旁貸，任重而道遠。蘇新春的研究在這一方面走在了前列。在本書出版的時候，我近年撰寫的《語言的文化闡釋》、《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意義》、《文化語言學》等著作及我主編的《文化的語言視界——中國文化語言學論集》、「文化語言學」叢書、《當代中國語言學論綱》等著作都將出版。文化語言學將以其嶄新的步伐進入中國語言研究的各個領域——這是我讀蘇新春這本著作的一個強烈感受。

當代漢語詞義研究的中興，使中國現代語言學在經歷世紀初「文化——語義」斷裂的危機之後，重新獲得了一種健全的、植根於漢民族文化傳統並加以創造性轉化的運動形態。它正在將西方語言學的語義分析方法同中國語文研究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迸發出新的生命力。有一種觀點認為，詞義描寫的精密化、科學化和詞義與文化的貫通是互相矛盾的，因為文化的研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語言研究。這是一種誤解。當代詞義研究已經證實，語義的描寫和語義文化內涵的揭示是互相促進、互為前提、缺一不可的。離開了語義的文化內涵，不可能有科學、嚴密的語義描寫，甚至連詞義都無法繫聯。反過來，只有深入、系統地描寫語義，才能對一種文化作出科學的闡釋，詞義與文化的貫通，不僅意味着研究過程中充分關注詞義與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決定，而且意味着漢語的語義分析必須而且只能從豐富的語義材料中提煉出具有漢民族特點，符合漢語意義體系實際的範疇、理論、規律和方法。這是因為人類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的語義系統之間存在着不可通約性。例如漢語通釋語義的雅書是由採集諸書訓詁名物作客觀排比而成的。這種編纂體例決定了雅書同條訓詞與被訓詞，以及被訓詞之間關係的臨時性。我們不可能以語義學嚴格意義上的義場或義位的定義來看待雅書的語條。又如義羣的歸納、繫聯也都有不同民族語言特有的範式和規律。因此，科學的漢語語義研究，不是走捷徑、圖省力去生搬硬套西方的語義分析理論，而是要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同時把立足點放在漢語語義的特點上。而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國傳統的語言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方法的財富。當代漢語詞義研究的每一進展，無不是對語文傳統重新發現、重新解釋的結果，捨此就談不上中國語文的現代化。我們相信，科學的漢語語義研究將成為中國現代語言學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新轉機。它將不僅對漢語的語法語音等其他方面的研究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與中國哲

學、藝術、美學、心理學、文學、史學等各文化學科交叉滲透，成爲中國文化研究中一門領先科學。

在蘇新春這部著作出版的時候，我們相信會有一大批年輕人的語言學新著陸續面世。就語義的研究來說，四川大學宋永培的《說文》詞義系統研究，湖南師大李運富的古漢語詞匯系統研究，東北師大李亞明的訓詁價值意義的研究，杭州大學梁曉虹的佛教詞匯研究，湖南師大蔣冀騁的近代漢語詞匯研究，河南大學任繼昉的語源學史研究，雲南民族學院趙虹的古漢字文化闡釋，華東師大臧克和的《管錐篇》釋義學研究，杭州大學傅杰的現代訓詁學史研究，上海師大陳五雲的俗文字學研究，哈爾濱師大張黎的語義範疇研究等等，都是引人注目的漢語語義探索。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正期待着中國語言學的年輕一代做出新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以上這些話不僅寫給蘇新春這部新著，而且寫給所有孜孜不倦的同道——讓我們攜手起來！

（上接頁 22）

除上文初步指出的幾方面以外，佛教與漢字、佛教與修辭等的關係也很密切。如應翻譯佛典而造的新形聲字，「魔」、「塔」、「懺」等；爲介紹新概念而改造的漢字，「袈裟」、「茉莉」等。佛典中大量的譬喻的應用，可從修辭學的角度分析，亦可從詞匯學的角度考察，內容都很豐富。